

国家与社会:后危机时期的制度变革

——新制度经济学视域下的中国模式

陈 庆

(上海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上海 200030)

【摘 要】 现代社会中生产社会性与资本分散性这一对矛盾是导致周期性社会经济危机反复出现的主要根源,国家在解决此类问题时“集权”抑或“分权”的应对策略,在客观上又为下一轮危机的来临埋下了伏笔,如此以至于循环。基于这一背景,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范畴与分析方法,推导出适应各改革阶段的最优化制度安排并加以论证,同时结合中国近 30 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功案例,为未来新一轮制度变革提供方法论指引。

【关键词】 国家与社会;社会经济危机;制度变革;新制度经济学;中国模式

【中图分类号】 F1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45X(2014)01-0022-07

马克思在其《资本论》中曾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归结为“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固有矛盾。在现代语境下则可理解为“生产社会性与资本分散性”的相容问题。具体来说,分散的资本虽有助于各自资源禀赋优势的发挥,但极易诱发整体生产的无序性,加剧贫富分化与结构失衡;与此相反,集中的资本尽管有效强调了社会生产的协调性,然而却以整体决策湮没了个人选择,终而造成集体行动的逻辑困境^[1]。为应付上述问题,18 世纪以来的各现代国家均规律性地表现出“从集权到分权再到集权”的行为特征,而其中的内在悖论则为周期性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本文基于这一背景,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视角出发,运用委托代理的模型框架,推导出适应改革各阶段的最优化制度安排,并通过集体行动、产权与交易费用理论对之加以论证,最后借助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经验案例,旨在为十八大以来新一轮的制度改革攻坚提供方法论指引。

一、文献综述

(一) 国家与社会

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社会中心论者,传统上认为国

家制度是社会不同利益集团之间斗争、妥协的产物,又或者说是—一个阶级借以统治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因此反映的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利益诉求。然而无论是冷战时期普遍盛行的国家干预主义,还是广—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纷纷仿效的东亚威权主义,都毫无疑问地凸现出国家具有的主体性特征,即国家“超越社会团体的短期利益,转而构筑系统长远发展战略”的主观愿望及能力^{[2]3-38}。实效上看,国家干预一方面降低了转型时期高昂的“交易成本”,通过制度安排为市场运行提供了规范性基础^{[2]44-72};另一方面则依靠强制力量调整资源配置,旨在加快目标产业的“资本积累”,进而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赶超^{[2]78-105}。

具体到行为方式上,国家主导模式自上而下地带有“委托代理”特征,其方法措施大体可归结为“集权”、“分权”与“合作”三种不同类型^[3]。就博弈主体而言,本文之所以选取“国家与社会”而不是“政府与市场”,纵向上是出于研究连续性的需要,即通过“大历史”^①的研究视域跨越政权更迭、集团兴亡所带来的历史断层^[4];横向上则考虑到观察视野的拓宽,尽可能将包括行政在内的立法、政党、企业、工会等各式利

【收稿日期】 2013-07-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3&ZD047)

【作者简介】 陈 庆(1983-) 浙江杭州人,男,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本文得到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谢贻予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徐明棋研究员、经济研究所杨宇立研究员、钟祥财研究员以及朱平芳研究员的有益指导,谨在此致以谢忱,然文责自负。

①“大历史”又称宏观历史(macro-history),与注重事件考查的“微观历史”相对,强调对整体逻辑和发展脉络的探索。

益集团都包括进来,强化结论部分的一般方法论意义^{[2]3-38}。

如此一来,通过“国家自主性”及“委托代理”等概念范畴的引入,使得文章的理论分析部分更为切合转型期国家的客观实际,避免了当下“西方普世价值”的空洞说教,有利于从制度博弈视角寻找破题的方向。

(二) 制度与危机

基于上文可将制度的形成理解为“国家”与“社会”两大行为主体之间博弈均衡的结果^[5],而这种利益均衡关系一经形成便具有了相对独立的意义,从而反作用于既有的资源利益格局并使之逐渐固化,成为未来进一步制度变革的障碍^[6]。然而现实生活中,时间的推移加之条件的变迁都不可避免地会使各个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改变——好像“自然垄断”与“搭便车”现象一样,这也客观上对制度安排的匹配性提出了新的要求。

奥尔森认为,既得利益集团给社会发展所带来的限制与约束,如果不经历战争一类的突发性事件(“奥尔森振荡”),则很难得到突破乃至陷入发展停滞的地步^[7]。这里的“战争”即可理解为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极端情况,最集中地反映了社会经济危机的情况。换句话说,社会经济危机的冲击迫使既得利益集团重新洗牌,从而有效打破了原有的制度僵局,为新一轮改革提供了契机。但需注意的是,由于各自危机产生的机理不尽相同,制度演化在方向上也呈现出截然相反的特征,吴晓波将此概括为游走于“集权”与“分权”之间的历史周期率^{[8]①}。

具体说来,“集权”的制度安排往往与“民粹主义”思潮相伴生,特点在于对公平正义的颂扬,以及对计划干预的推崇,旨在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从而有效抵御外部冲击^[9]。然而其赖以运行的压力环境一旦解除,“搭便车”^②现象则势必蔓延开去,导致效率的普遍下降,甚至可能将整个社会推至崩溃的边缘。然而这样一来,却反倒为下一轮以“自由主义”为中心的“分权式”改革铺平了道路^[10]——后者重视发挥市场“看不见的手”作用,着眼于调动个体主观能动性^[11],鼓励“创造性毁灭”进而推动社会进步^[12]。但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使自然垄断成为市场的必然——不仅加剧了贫富间的分化对立,还严重削弱了社会的动员能力和凝聚力,使国家在突发性挑战中变得脆弱不堪,于是又为再下一轮的“集权”改革拉响了汽笛^[13]。

针对如何破解上述制度变革中的双重悖论,本文

创新地借助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并结合博弈论的规范分析方法,旨在探索一套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用以跳出历史以往“左右路线之争”的怪圈,为中国乃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未来发展道路提供理论指引^[14]。

(三) 新制度经济学与中国模式

新制度经济学最早由威廉姆森、科斯与诺斯等人提出,目的在于“探索人、制度与经济活动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此后随着交易费用、产权安排以及制度变迁等新概念的相继提出,加上一般均衡与博弈论等分析范式的沿用,这一学派很快得到了主流认可^[15]。在解释力方面,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视域更为宽阔也更加贴近现实实际,与新古典经济学“抽象无摩擦”的理念世界形成强烈反差,由是使人们得以洞悉社会生产函数这一传统“黑箱”的内部构造和运行机理,为解释落后国家普遍存在的“李约瑟之谜”^③提供了理论启迪^[16]。

这一领域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两个方面,前者主要围绕法律法规和社会组织展开,研究人类理性与制度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制度对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可能造成的影响^[17];后者则透过诱致性制度变迁视角,重点探讨商品要素价格、工艺科技水平以及分工协作关系对制度演进的牵引作用^[18]。诺思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制度划分为“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及实施机制”三个层次,并指出后两者对前者的潜在影响和内在制约,暗示出一国发展模式的选定绝不能简单照搬他国经验,而还须与本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19]。

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在历经30多年的试错性改革之后,终于逐步摸索出一条与中国国情相适应、且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即所谓“中国模式”^[20]。就此,乔舒亚·雷默(Joshua Ramo)最早提出了“北京共识”的概念^[21],并将中国的渐进式改革理念与“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两相比较,揭示出激进式改革背后的市场原教旨主义错误^[22-23]。雅克(Jacques)则从文化传统、地缘政治和历史脉络的多元视角,研究了“中国崛起”与其

① “历史周期率”最早由黄培炎提出,此处代指一国历史中政权兴衰治乱、循环往复的周期性现象。

② “搭便车”有主动与被动之分,前者可理解为个人针对集体所采取的道德风险行为;后者则是指个体理性向集体“非理性”妥协的产物。

③ “李约瑟难题”原指“工业革命为何没有在具有相当科技成就的古代中国产生?”本文处则泛指自然禀赋相近、社会发展却显著异化的国家之间的比较问题。

外部性在未来数十年可能给世界带来的影响^[24]。

回归到新制度经济学的范畴,张五常提出的“县域经济现象”是“中国经济制度”较为权威的解释之一——即通过明晰科层制政府体系的考评标准与利益分成,鼓励地方政府开展经济锦标赛,由上到下地推动社会向前发展^[21]。白承旭(Baek)则尝试沿用东亚“发展型国家”^①的共通特征来概括“中国模式”,包括:支持国有企业、鼓励基础投资、促进出口创汇、强调金融管制等等^[25]。最近国内学者史正富也在其书中旗帜鲜明地将“中国模式”之所以成功的关键归结为“三维市场体制”,并列示出这一模式的“四大支柱”和“比较优势”^[26]。

当然也有学者对此表示出理性的质疑,布思林(Breslin)就指出:(1)官僚系统的政治需求将对经济发展的连贯性与执行力产生不良影响,使整体效率下降;(2)下放的经济决策权将引发地方投资冲动,进而推高财政赤字和不良贷款率;(3)“诸侯经济”也极易造成地方保护主义和恶性竞争,削弱国家的全局统筹和协调能力^[27]。实证检验方面,倪志伟(Nee)等通过数据的计量发现,中国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与企业经济绩效之间实际存在负相关关系,从而得出了与过往研究截然相反的观点^[28]。

概而言之,就如何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这一热点问题,本研究借鉴西方主流学术话语体系,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对中国近30年来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加以诠释,试图在厘清机理的同时也为后续改革指明方向。

二、理论分析

(一) 假设与前提

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长期为国家所主导,于近代则先后表现为清末的官僚资本主义、国民政府时期的国家资本主义,以及新中国前30年的计划经济和后30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计四个主要阶段^[29]。考虑到东方传统下的“国家-社会”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委托-代理”的行为特征,因此也使得委托代理模型的运用成为可能^[30]。

本文假设“国家”为委托人、“社会”为代理人,两者由契约关系相维系,其中委托人通过代理人间接获利,其间博弈双方虽然效用函数不尽相同但均理性自利;除此之外,代理人还一定程度上具有信息优势并存在道德风险的可能。因而求解这一委托代理问题的关键即在于找寻制度层面的最优方案,用以诱使代理人

最大限度地为委托人的利益努力^[31]。同时这里还需注意到关键外生变量对模型解的具体影响(角点解或内点解),其中最为主要的有:(1)行为主体的风险偏好变量——按照博弈双方预算约束的软硬程度,本文定义国家主导模式中的“国家”(委托人)风险喜好、“社会”(代理人)风险规避^②,且其偏好程度的大小还随着改革进程的演进呈现出“此长彼消”之势^[32];(2)社会事业产出的不确定性变量——由于影响因素的纷繁复杂,社会试验结果往往难以精确估量,通常只好采用概率分布的形式衡量。本文以正态函数的均值 μ 和方差 σ 分别反映期望目标和平均偏离程度,且此二者会随时间、对象的改变而不同。

(二) 建模与推演

1. 初始条件

设代理人的产出函数: $\gamma = \alpha + \varepsilon$, $\varepsilon \sim N(0, \sigma^2)$,其中 γ 为实际产出收益, α 为代理人努力程度,扰动项 ε 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 σ^2 的正态分布,这里的方差即代表不确定性(风险)程度。设代理人的报酬函数: $\omega = \tau + \theta\gamma$,其中报酬值 ω 由固定收益 τ 与分配率 θ 决定。本文进一步将 θ 引申为代理人的“索取权”,用于反映委托人与代理人双方的权责配比关系。其中委托人的收益是 $(\gamma - \omega)$ 的差值。设代理人努力程度 α 的成本函数: $Cost(\alpha) = \alpha^2/2$,其一阶导数大于0且边际成本递增。根据Arrow-Pratt测度,另设两行为主体的效用函数: $u(x) = |e^{-\rho_p x}|$ (委托人 $u_p(x) = e^{-\rho_p x}$ 、代理人 $u_a(x) = -e^{-\rho_a x}$),这里委托人风险偏好 $\rho_p < 0$ 、代理人风险规避 $\rho_a > 0$ ^③, x 作为博弈方的实际收益其具体取值由 γ 、 ω 和 $Cost(\alpha)$ 决定,并服从正态分布 $N(m, \nu)$,进一步推导可知确定性等值 $CE = m - \rho\nu/2$,即满足 $u(CE) = EU$ ^[3, 33]。

2. 模型推导

综合以上假设进行代换演绎,可分别求出委托人与代理人的确定性等值表达式:

$$CE_p = m_p - \frac{\rho_p \nu_p}{2} = \alpha(1 - \theta) - \tau - \frac{(1 - \theta)^2 \sigma^2 \rho_p}{2} \quad (1)$$

① “发展型国家”模式最早由战后日本开创,并为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相继所借鉴,以有效实现社会经济发展而闻名于世。

② 由“预算约束”与“风险偏好”的负相关关系得出。具体来说,预算约束越软,则风险资产的抵补率越高,行为主体的风险偏好程度也会较高;相反,预算约束越硬,则风险资产的抵补率越低,行为主体的风险偏好程度也会越低。

③ 下标p为principal的缩写,表示委托人;下标a为agent的缩写,表示代理人,下同。

$$CE_a = m_a - \frac{\rho_a v_a}{2} = \tau + \theta \alpha - \frac{1}{2} \alpha^2 - \frac{\theta^2 \sigma^2 \rho_a}{2} \quad (2)$$

考虑到效用函数 $u(x) = |e^{-\rho x}|$ 单调递增, 由 $EU = u(CE) = |e^{-\rho(m - \frac{\rho v}{2})}|$ 可知此时的确定性等值最大化即对应着期望效用的最大化。同时考虑到国家利益所具有的阶级性与全民性相统一特征^[34], 本模型将目标函数设定为委托人与代理人两行为主体的期望效用之和, 见式(3); 再行加上式(4) 激励相容与式(5) 参与约束的限制条件, 即构建出委托代理模型的函数方程组^[35]:

$$\max_{\theta, \alpha} CE_p + CE_a = [\alpha(1 - \theta) - \tau - \frac{(1 - \theta)^2 \sigma^2 \rho_p}{2}] + [\tau + \theta \alpha - \frac{1}{2} \alpha^2 - \frac{\theta^2 \sigma^2 \rho_a}{2}] \quad (3)$$

$$\text{s. t. } \max_{\alpha} CE_a = [\tau + \theta \alpha - \frac{1}{2} \alpha^2 - \frac{\theta^2 \sigma^2 \rho_a}{2}] \quad (4)$$

$$CE_a = \tau + \theta \alpha - \frac{1}{2} \alpha^2 - \frac{\theta^2 \sigma^2 \rho_a}{2} \geq CE_0 \quad (5)$$

3. 分析求解

为最优化求解目标函数, 构造拉格朗日函数:

$$L(\theta, \lambda) = CE_p + CE_a + \lambda(CE_a - CE_0) \quad (6)$$

出于简化目的, 令式(6)中 $CE_0 = 0$ 、 $\lambda = 1$, 此即意味代理人的机会成本为零, 拉格朗日乘子为1; 依据“反向归纳法”将代理人的最优努力程度 $\alpha = \theta$ ^① 代入式中, 可得^[36]:

$$L(\theta) = \theta + \tau - \theta^2 \rho_a \sigma^2 - \frac{(1 - \theta)^2 \rho_p \sigma^2}{2} \quad \theta \in [0, 1] \quad (7)$$

$$\frac{\partial^2 L(\theta)}{\partial \theta^2} = -\sigma^2(2\rho_a + \rho_p) \quad (\rho_a > 0, \rho_p < 0) \quad (8)$$

注意到 ρ_p 、 ρ_a 的时变特征可将改革全程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起先, 危机刚刚淡去, 人们大多余惊未了, 整个社会处于混沌状态, 风险规避情绪严重; 此时的国家精英们也尚未形成一套清晰的改革思路, 只能一点点摸着石头过河, 风险喜好程度较低——于是式(8)中的 $2\rho_a + \rho_p > 0$, 故而 $L(\theta)$ 的二阶导数小于0, 函数图像上凸。之后, 随着复苏步伐加快, 社会个体也逐渐活跃起来, 风险规避程度显著下降; 此时国家精英们也从既往经验中汲取了大量养分, 表现出踌躇满志, 风险喜好程度明显加增——因而式(8)中 $2\rho_a + \rho_p < 0$, 于是 $L(\theta)$ 的二阶导数大于0, 函数图像下凹。以下将分别就上述一前一后两个阶段, 分别对目标函数 $L(\theta)$ 的最值情况进行考察与论证。

(三) 结果与案例

1. 前期阶段($\frac{\partial^2 L(\theta)}{\partial \theta^2} < 0$)

这一阶段目标函数的图像呈上凸形, 传统意义上的最大值在抛物线顶点处取得, 即一阶导数 $\frac{\partial L(\theta)}{\partial \theta}$ 为零处, 此时 $\tilde{\theta} = \frac{1 + \rho_p \sigma^2}{(2\rho_a + \rho_p) \sigma^2}$ 。然而实际分析中还需考虑定义域 $\theta \in [0, 1]$ 的范围限制, 具体应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1) 当 $\tilde{\theta}$ 小于 $\theta \in [0, 1]$ 时, 函数最大值如表1所示。学理上, 根据威廉姆森的观点, 当契约所涉及的资产专用性程度较高时, 与之关联的交易成本也将较多, 此时如一方违约则给另一方造成的损失也将较大, 因此客观上需要第三方强制力的存在以提供必要的担保^[37]; 巴泽尔有关“契约不完整性”的论述则认为, 社会交易中往往存在着大量难以界定产权的、或由外部性形成的“公共财产”, 而这部分资源的有效利用只能依赖于集权组织——即最终为国家所掌控^[38]。因此, 当“违约性损失”或“外部性溢出”的可能性较大(高风险)时, 国家干预则成为了符合逻辑的最优选择。

表1 前期的高风险事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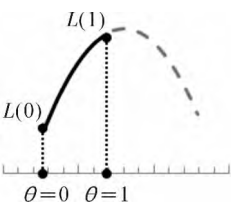
图像解析	备注详解
	- 抛物线顶点位于定义域左边, $\tilde{\theta} < 0$, 即有 $\sigma^2 > -\frac{1}{\rho_p}$ - 图像在定义域内单调递减, $L(\theta)$ 在 $\theta=0$ 处取得最大值 - 当事业不确定性(风险)较高时, 委托人应占有全部产出成果, 代理人仅获得固定收益 CE_0;
	建议采用“集权”的管理模式

(2) 当 $\tilde{\theta}$ 大于 $\theta \in [0, 1]$ 时, 函数最大值如表2所示。学理上, 奥尔森分析认为, 由于组织费用、信息成本及搭便车等现象的存在, 选择性激励通常在小集体中更易促成一致行动^[1]。与此观点相类似, 奥斯特罗姆也认可“当能有效组织从而进行制度创设和自我管理时, 任何系统外的干预都是弊大于利的”, 这里所说的“系统”主要代指小规模集体^[39]。如此一来, 针对现实生活中不确定性较小(低风险)的事业, 市场放任

① 由式(4)的二阶导数为负可知, 代理人的确定性等值函数在其一阶导数为0处取得最大值, 此时有 $\alpha = \theta$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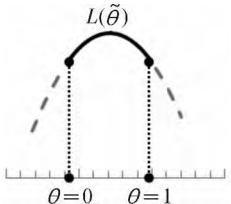
的管理模式要来得更加可行一些。

表2 前期的低风险事业

图像解析	备注详解
	• 抛物线顶点位于定义域右边，$\tilde{\theta} > 1$，即有 $\sigma^2 < \frac{1}{2\rho_a}$ • 图像在定义域内单调递增，$L(\theta)$ 在 $\theta=1$ 处取得最大值 • 当事业不确定性(风险)较低时，委托人应放弃全部产出成果，充分调动代理人的积极性：建议采用“分权”的管理模式

(3) 当 $\tilde{\theta}$ 介于 $\theta \in [0, 1]$ 时，函数最大值如表3所示。学理上，国家的适度干预不仅有助于管控风险，还能拾遗补漏、填补市场缺位^[37-38]；同时，明晰的产权则有益于调动社会积极性，发挥自我管理优势、提高资源运行效率^[1, 39]。因此，“放调结合”的折中办法既可以防范系统性风险，又能在边际上推动了改革，从而有助于实现帕累托改进，中国1985-1993年的“价格双轨制”改革即是这一领域较为典型的成功案例^[40]。

表3 前期的中等风险事业

图像解析	备注详解
	• 抛物线顶点位于定义域中间，$0 < \tilde{\theta} < 1$，即有 $\frac{1}{2\rho_a} < \sigma^2 < -\frac{1}{\rho_p}$ • 图像在定义域内先单增后单减，$L(\theta)$ 在 $\theta=\tilde{\theta}$ 处取最大值 • 当事业不确定性(风险)中等时，委托人应与代理人分享产出成果，让代理人尝到甜头：建议采用“合作”的管理模式

从现实视角出发，中国近30年来的“增量改革原则”恰好与上述三个部分的建议内容大相契合，且主要围绕“价格”与“产权”两条主线展开——其中，前者按照“普通商品”和“资源要素品”^①划分，分别执行市场定价与政府指导价；后者则根据“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②归类，小头上鼓励私有改制、大头上则仍坚持国有控股；余下的中间领域，则变通地采取政府扶持与商业运作双管齐下的“合作”模式。回过头看，也正是归功于如此这般差异化的综合管理方案，才使中国得以在维持近30年来社会整体稳定的同时，有效激发经济活力进而成就改革开放中举世瞩目的持续高速发展^[41]。

2. 后期阶段($\frac{\partial^2 L(\theta)}{\partial \theta^2} > 0$)

然而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前一阶段的管理模式也逐渐暴露出一些新问题，尤其是在“政商合作办企”的环节，套用环境保护部周生贤部长的话来说，就是“老板赚钱、群众受害、政府埋单”^[42]。究其缘由：一方面，“合作制”企业的自身市场优势主要源自政策倾斜，即通过扭曲资源配置、抑制有效竞争以获得超额利润，故其在过程和结果上都有失公平；另一方面，特殊的政企关系客观上软化了市场主体原有的预算约束，将风险转嫁给了政府，其到头来经营不善的亏空也顺理成章地由政府来兜底，一时间道德风险激增、舆论反响强烈。

为解决此类问题，继续深化改革的理论建议还应进一步包含以下两方面的内容：(1) 当 $L(1)$ 大于 $L(0)$ 时，函数最大值的取得如表4所示；(2) 当 $L(1)$ 小于 $L(0)$ 时，函数最大值的取得如表5所示。

表4 后期的低风险事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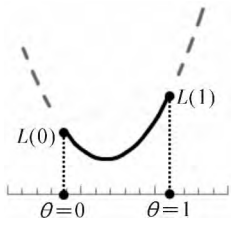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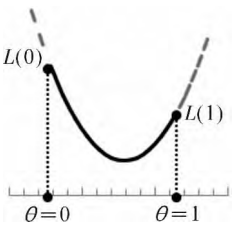
图像解析	备注详解
	• 当 $1 + \tau - \sigma^2 \rho_a = L(1) > L(0)$ $= \tau - \frac{\sigma^2 \rho_p}{2}$，有 $\sigma^2 < \frac{2}{2\rho_a - \rho_p}$ • 图像在定义域内先单减后单增，$L(\theta)$ 在 $\theta=1$ 处取得最大值 • 事业不确定性(风险)较低时，委托人应放弃全部产出成果，充分调动代理人的积极性：建议采用“分权”的管理模式

表5 后期的高风险事业

图像解析	备注详解
	• 当 $1 + \tau - \sigma^2 \rho_a = L(1) < L(0)$ $= \tau - \frac{\sigma^2 \rho_p}{2}$，有 $\sigma^2 > \frac{2}{2\rho_a - \rho_p}$ • 图像在定义域内先单减后单增，$L(\theta)$ 在 $\theta=0$ 处取得最大值 • 事业不确定性(风险)较低时，委托人应占有全部成果，代理人仅获得固定收益 CE_0：建议采用“集权”的管理模式

① 根据 PMI 的定义，文中“普通商品”代指中间品、生活消费品与一般性制成品，“资源要素品”则涵盖原材料和能源，如水、电、油、气等基础类产品。

② “集体企业”泛指乡镇、街道一级，多用以满足周边区域内的居民、企业需求，规模一般较小；“国有企业”则通常由市、县一级负责，大多跨地域经营、渠道广泛，规模往往较大。

实践层面上看,中国房地产业的政策演变即是上述两方面理论建议的最好印证。首先,房地产作为龙头产业,行业关联性强、影响面宽,在国民经济增长中占有较高的权重;其次,房地产受不动产特性制约,囿于地理区位条件,辐射范围上存在明显瓶颈,因而总体上可归为“中等风险事业”。在此基础上,与之相对应的产业政策也先后经历了一个从“合作”阶段向“集权”或“分权”两极化阶段发展的过程。

具体来说:房开企业在“住房制度改革”初期,享受到了一系列来自地方政府的政策倾斜,涉及包括“动迁准备”、“规划施工”以及“配套预售”等方方面面,并借此享受了一段超高速增长“黄金时期”。然而,企业“背靠大树好乘凉”的依赖特性使得低水平重复建设成为常态,建筑工艺止步不前。与此同时“暴力拆迁”、“偷工减料”甚至“工程烂尾”等系列性丑闻却层出不穷——一方面是屡治无果的畸高房价,另一方面则是沸腾的民怨和无奈的政府,直至到了不可不改的境地^[15]。

2007年8月中国政府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国发第24号),这标志着“住房制度改革”进入到后期阶段,并由此拉开了经适房和廉租房投资建设的序幕;2012年中共十八大更是将“保障性住房建设”首次写入党代会报告,从而成为后续政策的重要着力点^[43];近期中国多个地方又进一步展开新一轮保障房政策的试点,尝试酝酿将经适房制度向廉租房制度统一并轨过渡。言而总之,借用知名地产商任志强的观点,即是“让政府管好保障,任商品回归市场”——如此这般泾渭分明的“制度双轨”恰好也成为了本文改革“后期”最优化理论建议的现实注脚。

三、讨论与引申

综上所述,“中国模式”的成功绝非历史的偶然,它不仅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还强力回应了冷战后国际多边环境“和平、竞争与发展”的根本诉求。该模式既强调“国家主导”又鼓励“市场推动”,在实现市场有效嵌入的同时,也不放弃科学计划的协调统筹,进而顺应了当今资本技术劲涌发展、组织环境日趋复杂的世界性潮流。

实际上,国家干预不仅有利于实现社会资源的快速集中,进而增强国力以抵御风险,更重要的是在于民族凝聚力的提升——美国学者乔尔·科特金通过研究全球几千年来的城市发展历史,将维系文明的三大核

心要素概括为“神圣、安全与繁荣”,并特别指出意识形态在团结社会成员时所发挥的关键纽带作用^[44],也即今日之国家认同。出于这一客观需要,“自主性国家”方才得以应运而生并发展成为使人敬畏、受人景仰的“新的伟大神庙”,而与之相伴生的“短缺经济学”^[45]则大可被视为节制资源滥用的人为约束。

与此同时,自由市场在形式上和机理上有助于鼓励社会各利益集团间的竞争和流动,进而为孕育熊彼特所言之“创造性毁灭”准备了条件。在此背景下的新兴上升阶层得以通过竞争替代旧的既得利益阶层,从而促进社会的新陈代谢和循环轮替^[13],同时还为推动制度演进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持。

总之,中国近30年来所走的改革开放道路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市场化转轨,而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在试错中前行且反映实际国情的制度变革之路。本文的研究意义即在于探索如何把握好危机后的变革良机,通过运用多样化的社会治理手段维护国家安定团结和繁荣昌盛,并实现经济赶超和社会跨越的伟大“中国梦”。

[参 考 文 献]

- [1] 曼瑟尔·奥尔森. 集体行动的逻辑[M]. 陈 郁, 郭宇峰, 李崇新 译. 上海: 格致出版社, 2011: 8-30.
- [2] EVANS P, RUESCHEMEYER D, SKOCPOL T.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M]. London: Cambridge Press, 1985.
- [3] 陈 庆. 转型期政府与市场的制度博弈——一个委托代理模型的中国案例分析[J]. 南方经济, 2013, 288(9): 17-26.
- [4] 黄仁宇. 中国大历史[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1-8.
- [5] WHITTINGTON K, CARPENTER D. Executive Power in American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J].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2003, 1(3): 495-513.
- [6] 拉古拉迈·拉詹, 路易吉·津加莱斯. 痼疾难消的贫困: 政治制度、人力资本还是利益集团[M]//吴敬琏. 比较: 第25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6: 57-81.
- [7] 曼瑟尔·奥尔森. 国家的兴衰: 经济增长、滞胀和社会僵化[M]. 李增刚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17-35.
- [8] 吴晓波. 中国自由化改革的边界[EB/OL]. [2013-03-13].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9367>.
- [9] ROBERTS K M. Populism, Political Conflict and Grass-Roots Organization in Latin America[J]. Comparative Politics, 2006, 38(2): 127-148.
- [10] BALL R. Individualism, Collectiv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s

- cal and Social Sciences, 2001, 573: 57-84.
- [11] UDEHN L. The Changing Face of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2, 28: 479-507.
- [12] 约瑟夫·熊彼特. 经济发展理论[M]. 邹建平, 译. 北京: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2: 210-246.
- [13] BEJAR A A, BRENA M O. The Rise of Populism and the End of Neoliberalism? [J].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 2006, 33(2): 17-32.
- [14] BOOTH A. Night Watchman, Extractive, or Developmental States? Some Evidence from Late Colonial South-East Asia[J].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007, 60(2): 241-266.
- [15] 卢现祥, 朱巧玲. 新制度经济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2-14.
- [16] 青木彦昌. 比较制度分析——起因和一些初步的结论[M]//孙宽平. 转轨、规制与制度选择.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118-144.
- [17] 罗伯特·埃克伦德, 罗伯特·赫伯特. 经济理论和方法史[M]. 杨玉生,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361.
- [18] 弗农·拉坦. 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C]//罗纳德·科斯, 阿门·阿尔钦, 道格拉斯·诺斯.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329-333.
- [19] 道格拉斯·诺斯.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 杭行, 译. 上海: 格致出版社, 2008: 7-36.
- [20] PEERENBOOM R. China Modernizes: Threat to the West or Model for the Rest?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26-81.
- [21] 张五常. 中国经济制度[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9: 141-165.
- [22] 胡键. 争论中的中国模式: 内涵、特点和意义[J]. 社会科学, 2010(6): 3-11.
- [23] 石磊, 张翼, 寇宗来. 演进中的“中国模式”: 战略、机制与架构[J]. 社会科学, 2010(3): 22-31.
- [24] JACQUES M.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 [M]. London and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nd edition, 2012: 151-435.
- [25] BAEK S W. Does China Follow "the East Asian Development Model" [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2005, 35(4): 485-498.
- [26] 史正富. 超常增长: 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133-150.
- [27] BRESLIN S. China: Developmental State or Dysfunctional Development? [J]. Third World Quarterly, 1996, 17(4): 689-706.
- [28] NEE V, SONJA O, SONIA W. Developmental Stat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China [J].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07, 3(1): 19-53.
- [29] 章立凡. 清末以来中国三次“国进民退”的历史教训[J]. 文史参考, 2010(3): 35-39.
- [30] WATERMAN R, MEIER K. Principal-Agent Models: An Expansion? [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1998, 8(2): 173-202.
- [31] BEBCHUK L, JESSE F. Pay without Performance, the Unfulfilled Promise of Executive Compensation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1-20.
- [32] KORNAI J, ERIC M, GEARD R. Understanding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1(4): 1095-1136.
- [33] GROSSMAN S, HART O. An Analysis of the Principal-Agent Problem [J]. Econometrica, 1983, 51: 7-45.
- [34] 李爱华. 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利益观[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6(11): 45-52.
- [35] HOLMSTROM B. Moral Hazard and Observability [J]. 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9, 10(1): 74-91.
- [36] SHAVELL S. Risk Sharing and Incentives in the Principal and Agent Relationship [J]. 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9, 10(1): 55-73.
- [37] 奥利弗·威廉姆森.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论企业签约与市场签约[M]. 段毅才, 王伟,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227-288.
- [38] 约拉姆·巴泽尔. 产权的经济分析[M]. 费方域, 段毅才, 译. 上海: 三联出版社, 1997: 1-37.
- [39]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 集体行动的制度演进[M]. 余逊达, 陈旭东,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0: 51-160.
- [40] 杨瑞龙. 价格双轨制的核心——增量改革[J]. 当代财经, 2012, 326(1): 10-11.
- [41] 华生. 双轨制的历史使命和现实意义[J]. 当代财经, 2012, 326(1): 5-6.
- [42] 周生贤. 不允许“老板赚钱, 群众受害, 政府埋单”[N]. 人民日报, 2007-07-10.
- [43] 仇广宇. 保障性住房建设写入十八大报告[EB/OL]. 中国新闻周刊网. [2012-11-15]. <http://insight.inews-week.cn/report-7788.html>.
- [44] 乔尔·科特金. 全球城市史[M]. 王旭,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1-11.
- [45] 亚诺什·科尔纳. 短缺经济学[M]. 张晓光, 李振宁, 黄卫平, 译.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6: 273-299.

(责任编辑: 张丛)
(下转第42页)

- [11] 孙天琦,袁静文. 国际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改革进展与趋势[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5): 9-17.
- [12] 元峰. 现代金融教育发展的新思考[J]. 金融研究, 1998(7): 67-68.
- [13] 刘玫. 推广普及金融教育,提高公众金融素质[J]. 金融经济, 2010(12): 145-146.
- [14] 钱海波. 投资者教育重心的选择[J]. 经济论坛, 2002(20): 20-21.
- [15] 何琳洁,连进军,马超群. 中国证券市场投资者教育探析[J]. 邵阳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4): 39-42.
- [16] 周光耀,周文平. 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中存在问题及对策[J]. 河北金融, 2012(2): 12-13+28.
- [17] CHENG P Y K. The trader interaction effect on the impact of overconfidence on trading performance: An empirical study [J]. The Journal of Behavioral Finance, 2007, 8(2): 59-69.
- [18] 陈斌,李信民,杜要忠. 中国股市个人投资者状况调查[R]. 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研究所, 2002.
- [19] FAMA E F, FRENCH K R. Multifactor explanations of asset pricing anomalies [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1996, 51(1): 55-84.
- [20] HESHMAT N A. Non-professional investors' behavior: an empirical study of female Saudi investor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erce and Management, 2012, 22(1): 75-90.
- [21] 赵振华,刘淳,廖理. 是谁获得了更好的基金投资收益?——对个人投资者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J]. 金融研究, 2010(5): 166-178.
- (责任编辑: 张丛)

Impact of Financial Knowledge of Individual Investors on Stock Investment Return

ZHANG Jun-rui¹, LENG Ao-lin¹, DONG Nan-yan¹, XING Guang-yuan²

(1. School of Management,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2. Bank of China, Xi'an 710049, China)

Abstract To work out whether the acquirement of financial knowledge of Chinese individual investors will affect their stock investment return, it was found from the investigation of characteristics, income, and the mastery level of financial knowledge of Chinese individual investors of stocks that financial knowledge boosts investors' overconfidence and irrational behavior and has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investment return. The higher the income of the investors, the more they will earn when acquiring additional financial knowledge and the more they master the financial knowledge, they more they earn with such knowledge. However, one-sided learning of financial knowledge will bring about negative investment returns.

Key words stock investment; financial knowledge; investor characteristics; stock investment return

(上接第28页)

The State - Society Relation during Post - crisis Period:

The China Model under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CHEN Qing

(Institute of Economics,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200030)

Abstract Social crises break out periodically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are incurred either by the centralized or the decentralized management system, which are adopted by the state for public benefit to coordinate different interest groups within the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his article illuminates the starting formation and following consequence of usual methodologies in mechanism reforms, and reveals the inner logic of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recent 30 years based upon the theory of Principal-agent and Collective Action. Considering the different traditions of state theories between West and East, we should be of confidence and adhere to 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le keeping alert to the so-called "Universal Value" from the western world.

Key words State - Society; Social and Economic Crisis; Mechanism Reform;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China